

符号互动论视角下《南方与北方》鹅毛笔分析

李忠娜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摘要】：本文以符号互动论为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小说《南方与北方》中鹅毛笔这一书写工具的文化象征与社会互动功能。研究表明，鹅毛笔不仅是19世纪英国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具，更是一个承载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文化价值的动态符号。通过考察玛格丽特·黑尔、约翰·桑顿等主要人物对鹅毛笔的使用实践，本文揭示了书写行为如何在南方与北方异质空间的文化碰撞中，参与个体自我认知的形成、情感交流的展开以及社会关系的建构。结合盖斯凯尔夫人工业小说研究的既有成果及符号互动论理论，本文进一步指出，鹅毛笔的符号互动过程映射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动态的调适机制。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南方与北方》；盖斯凯尔夫人；鹅毛笔；身份建构；社会互动

DOI:10.12417/2982-3846.26.02.016

1 引言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的《南方与北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小说的典范之作。小说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黑尔从南方乡村迁居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的经历为主线，深刻呈现了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对立、劳资冲突、社会角色重构等问题。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共同体想象等宏观主题（王爽，2004；雷蒙德·威廉斯，1991），鲜有从物质文化史与符号互动的微观角度考察日常物品如何参与意义生成。符号互动论由米德奠基、布鲁默阐发，强调意义在社会互动中通过符号生成（Mead,1934; Blumer,1969）。鹅毛笔作为19世纪英国广泛使用的书写工具，其意义在具体情境中被不断定义。本文借鉴符号互动论，结合文本细读，分析鹅毛笔如何在南北不同空间碰撞中成为表达情感、彰显身份、构建关系的文化符号。

2 符号互动论的理论框架及其在文学分析中的适用性

符号互动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学术积累过程。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较早提出了“自我”概念，而约翰·杜威则强调了习惯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性。然而，真正为这一理论奠定系统基础的是乔治·赫伯特·米德。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一书中，通过对语言、姿态、游戏和竞赛等社会行为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心智与自我意识如何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米德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运用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交流，并通过角色扮演来理解他人的态度与期望。这种能力使个体能够将自身视为一个对象，从而形成自我意识。

赫伯特·布鲁默在米德思想的基础上，于1937年正式提出“符号互动论”这一术语，并归纳了该理论的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人类对事物采取行动是基于事物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第二，这些意义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第三，这些意义在个体面对具体情境时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中得到处理与修正（Blumer,1969）。布鲁默强调，意义不是事物固有的属性，也

不是个体心理状态的简单投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符号的使用而协商出来的。因此，要理解人类行为，就必须考察具体的互动情境以及行动者赋予符号的意义。

将符号互动论引入文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物品的单纯功能描述，转而关注物品在人物互动中所扮演的符号角色。正如刘爽（2022）指出，《南方与北方》中南方与北方本身就是互为镜像的异质空间，而人物在这一空间中的行动与选择，构成了意义生成的关键场域。鹅毛笔正是在这类异质空间中频繁出现的关键符号。它既连接着南方传统的书面文化与优雅礼仪，又介入北方工业社会对效率、精确与实用的追求。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鹅毛笔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人物、不同情境的互动中被反复定义、协商与再定义。

例如，对于南方出身的玛格丽特而言，鹅毛笔是她表达情感、维系家族联系的自然工具，承载着田园牧歌式的文化记忆。而对于北方工厂主桑顿而言，鹅毛笔则首先是记录账目、签署合同的商业工具。这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反映了南北方社会对书写行为的不同价值赋予。而当玛格丽特与桑顿通过书信进行交流时，鹅毛笔所书写的文本成为两者意义协商的中介，最终促成了彼此理解与情感融合。

因此，对鹅毛笔的符号互动分析，能够揭示维多利亚时期个体如何通过日常书写实践，协商自我身份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一微观视角与王爽（2004）对《南方与北方》中资本家形象与工人运动态度的宏观分析形成互补，共同丰富了我们对于盖斯凯尔夫人创作思想的理解。

3 鹅毛笔在《南方与北方》中的多重象征意义

在19世纪英国社会，能够熟练使用鹅毛笔进行书写，本身就是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鹅毛笔的制作与保养需要专门技巧，书写本身也需要长期训练，因此，书写能力并非人人具备。小说中，玛格丽特·黑尔出身于南方牧师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鹅毛笔是她表达思想、维系家族联系的自

然延伸。她的书写实践体现了南方知识阶层的优雅与教养。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工厂主约翰·桑顿的形象。桑顿凭借自身奋斗从店员成长为工厂主，跻身新兴资产阶级。王爽（2004）在分析《南方与北方》时敏锐地指出，桑顿身上体现了工业绅士的理想人格，既具备资本家的果敢与效率，又不放弃对古典文化与道德修养的追求。当玛格丽特惊讶地发现桑顿先生竟然在读书时（盖斯凯尔，2017），鹅毛笔所书写的文本已然突破了阶级偏见。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桑顿通过展示自己的书写行为与学识修养，成功地改变了玛格丽特对北方工厂主的刻板印象。

此外，桑顿的母亲桑顿太太虽然也是北方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员，但她对书写工具的态度与玛格丽特截然不同。她更看重实际事务而非舞文弄墨，这种差异同样折射出南北方社会对书写行为的不同价值评判。在符号互动论的视域下，同一物品对不同人物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恰恰构成了社会互动中误解与理解的根源。

符号互动论强调，情感的表达需要借助共享的符号系统。在小说中，鹅毛笔承担了重要的情感传递功能。玛格丽特与表妹伊迪丝之间的通信，以及她对远方哥哥弗雷德里克的秘密关怀，都依赖于鹅毛笔书写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是信息载体，更是情感投入与自我反思的场域，书写的过程使玛格丽特得以整理内心冲突，逐步形成对北方社会的复杂认知。

王爽（2004）在其论文中详细分析了《玛丽·巴顿》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指出盖斯凯尔夫人擅长“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来展现社会矛盾”。《南方与北方》同样继承了这一艺术特色。玛格丽特在米尔顿的生活中经历了从排斥到理解、从偏见到包容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书信书写起到了重要的自我澄清作用。当她向伊迪丝描述米尔顿的种种见闻时，她不得不将自己的感受诉诸语言，这一过程本身就促使她更加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情感与判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盖斯凯尔夫人并未简单地将鹅毛笔与南方感性绑定。当桑顿在表白遭拒后，独自前往赫尔斯通，并采摘了一朵蔷薇花夹在书中带回北方，这一行动虽未直接使用鹅毛笔，却构成了符号互动的变体：干枯的蔷薇花作为南方价值的象征，被桑顿以近乎“书写”般的珍藏姿态加以保存。刘爽（2022）认为，这一意象预示着北方新兴资产者同样认可了南方的价值观。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蔷薇花与鹅毛笔在此形成互文：两者都是承载意义的符号，前者通过自然形态传递情感，后者通过墨迹表达思想，共同构建了南北文化沟通的桥梁。这种非语言的符号互动，同样遵循着意义在社会互动中生成的基本逻辑。

此外，鹅毛笔还在小说中参与了法律文书与契约的签署。例如，桑顿在工厂经营遇到困难时，不得不签署一系列文件。

这些书写实践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象征意义，它们标志着新兴资产阶级在法治框架下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现代性进程。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法律文书中的每一个签名，都是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一次符号互动，既确认了个体对规则的服从，也强化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4 鹅毛笔与19世纪英国社会的文化互动

19世纪英国经历了教育逐渐普及的过程。虽然《南方与北方》成书时义务教育尚未全面推行，但书写能力已经不再局限于贵族与教士阶层。工人阶级代表尼古拉斯·希金斯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能够理解玛格丽特为他代写的求职信内容，并积极参与对话，这表明书写文化与口语文化在北方工业城市中已然交织。雷蒙德·威廉斯（1991）在《文化与社会》中强调，工业小说的重要价值在于呈现了新社会的感受结构。鹅毛笔的普及与使用差异，正是这种感受结构的物质投影。

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书写能力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符号，标志着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话语权与参与程度。能够使用鹅毛笔进行书写的人，更容易在公共事务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更容易被社会权力体系所认可。桑顿正是通过书写实践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工人阶级由于书写能力的相对欠缺，往往需要借助玛格丽特这样的中产阶级代言人来表达诉求。这种书写能力的不平等，折射出维多利亚社会深层的结构特征。

然而，盖斯凯尔夫人并未对此采取简单的批判态度。她通过玛格丽特为希金斯代笔这一情节，展示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劳资对话中的桥梁作用。鹅毛笔在此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赋权的象征，通过书写，原本沉默的底层声音得以进入公共领域。这种赋权虽然是有限的、代理性的，但至少开启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符号互动论特别关注互动中的角色关系。在《南方与北方》中，鹅毛笔的使用方式隐含着微妙的社会角色分工。玛格丽特的书写多服务于家庭情感与私人交际，而桑顿的书写则直接关联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这种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社会惯例。然而，盖斯凯尔夫人有意模糊了这一界限：玛格丽特通过书信为工人争取权益，实际上介入了传统的公共事务领域；桑顿学习古典文学并撰写富有文采的信件，又展现了对感性文化的尊重。

刘爽（2022）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雌雄同体”的性格特质与“彼此成就的共同体”。鹅毛笔在此成为跨越社会角色分工的实践工具，人物通过书写互动，不断协商着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规范边界。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社会角色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符号，其意义是在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当玛格丽特用鹅毛笔为工人发声时，她实际上在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个体不仅可以温柔体贴，也可以勇

敢担当。当桑顿用鹅毛笔学习古典文学时，他也在重新定义自身的形象，不仅要有力量与效率，也要有修养与情感。

这种社会角色的重新协商，在小说结尾的婚姻盟约中达到顶峰。玛格丽特与桑顿的结合，不仅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更是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生活方式的融合。而鹅毛笔作为贯穿始终的符号，见证了这一融合的每一个关键步骤。

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折中，而是通过持续的符号互动与意义协商而达成的动态平衡。玛格丽特与桑顿在书信往来中逐步消除了对彼此的偏见，在对话交流中逐步理解了对方的价值观念。鹅毛笔作为这一过程的物质媒介，见证了南北文化从对峙走向融合的完整轨迹。

5 结论

本文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出发，对《南方与北方》中鹅毛笔的象征意义与社会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鹅毛笔在小说中绝非中性的道具，而是一个积极参与意义生成、身份建构与社会关系调适的文化符号。通过考察不同人物对鹅毛笔的使用方式，我们得以窥见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个体如何通过日常的书写实践来协商阶级、地域之

间的边界。

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鹅毛笔在小说中是社会身份与教育背景的重要标识，桑顿通过对书写行为与古典文化的主动学习，成功地改变了玛格丽特对北方工厂主的刻板印象，实现了“工业绅士”形象的符号建构。第二，鹅毛笔承担了情感表达与思想交流的媒介功能，书信书写不仅传递信息，更促使书写者进行自我反思与认知调整，推动了人物的精神成长。第三，鹅毛笔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建构，通过商业契约、求职信件、法律文书等书写实践，鹅毛笔成为劳资对话、阶级沟通的技术节点。第四，鹅毛笔的使用折射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教育普及、社会角色分工与现代化进程，为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物质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符号互动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聚焦于微观互动与物质符号的方法论工具。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小说研究，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小说细节的解读，也能够与既有的宏观社会历史分析形成互补。正如王爽（2004）所言，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本文对鹅毛笔这一微小符号的考察，恰恰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贡献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参考文献：

- [1]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原版 Mead,G.H.(1934).Mind,Self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赫伯特·布鲁默.符号互动论:视角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出.(原版 Blumer,H.(1969).Symbolic Interactionism:Perspective and Method.Prentice-Hall.).
- [3]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4] 王爽.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小说——论《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 [5] 刘爽.《南方与北方》: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小说中的共同体想象[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28-134.
- [6]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南方与北方[M].柯艾略,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
- [7] 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8]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9] M K B,N M A.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multiple method research[J].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2001,33(4):541-547.
- [10] 米歇尔·福柯.激进的美学锋芒[M].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12]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 [13] 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